

民营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特征及其时空演变轨迹

——基于供给侧要素配置视角

郭玉晶，宋林

(西安交通大学 经济与金融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劳动力、资本和科技投入等要素的配置，而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文章从供给侧视角研究了1992—2014年民营经济增长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其时空演变轨迹。结论如下：从时间角度看，民营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与技术双驱动特征，且资本与技术呈现动态“螺旋式”交替状态，劳动驱动强度在2008年后有所上升；在空间分布上，民营经济增长空间重心偏向东南地区，资本重心在近年来开始转向中部地区，劳动力重心偏向东部地区，技术重心偏向东南地区；在区域范围内，各区域民营经济增长类型均以资本驱动型为主，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优势并未显现，东北经济区民营经济增长整体效应最低。

关键词：民营经济；要素配置；重力模型；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154(2016)04-0015-13

Features and Evolution Track in Time and Space about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Private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side Factor Allocation

GUO Yu-jing, SONG Li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e focus on supply-side reform is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labor, capital, technology input and other factors, and the private economy i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so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actor allocation efficiency of private economic growth and its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track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side. The results indicat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the driving strength of capital and technology shows upward spiral features from 1992 to 2014, and the driving strength of labor increases after 200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distance, the spatial center of gravity of private economic growth is still partial to the southeast while the spatial center of gravity of labor began to shift the central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scope, the advantages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human capital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has not appeared, and the efficiency of privat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ortheast economic region is the lowest, furthermore, the type of regional private economy growth is mainly the capital driven.

Key words: private economy; factor allocation; gravity model; supply-side reform

一、引言

回顾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制度特征就是对外开放与经济所

收稿日期：2016-01-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常态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路径选择研究”(15CJL028)

作者简介：郭玉晶，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宋林，男，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产业组织理论研究。

有制结构的优化,尤其是民营企业产权合法化和清晰化。厉以宁(2010)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经验,提出“无民不稳,无民不富,无民不活”的观点,他认为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1]。近年来,民营经济在自身壮大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报告指出,2011年,民营企业的GDP贡献已经超过了50%;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口的比例已经高达30.8%;民营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占65%,其总数是国有企业专利发明数的2.5倍。对于经济进入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民营经济扩张不仅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吸引大量劳动力,同时也能够提高潜在的创新水平。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框架,培育发展新动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配置,推动新业态蓬勃发展。从改革的目的和目前发展现状都可以看出,民营经济是推动中国未来经济转型和建立新的创新体制框架不可或缺的重要引擎,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对中国经济保持长久动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民营经济经过十几年的快速发展,其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推动其发展的内在要素是什么,它又是否会成为中国未来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在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准确研判民营经济的增长的驱动力,进而制定相对应的更加清晰和明确的政策。

二、理论与文献综述

典型的凯恩斯主义认为,为了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改善总需求。与凯恩斯主义不同,新供给经济学指出生产的增长取决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该学派主要来源于“萨伊定理”,即供给自动创造需要的理论,它是古典经济学最为重要的表述之一。“萨伊定理”强调市场的绝对主体地位,倡导经济政策以放任自由和不干预为主要特征。新供给学派则强调应正视现实,强化针对性,注重还原资源配置中“非完全竞争”的现实。新供给经济学认为优化资源配置的要求是市场和政府各有所为,不应简单地回归到古典主义所倡导的自由放任时代,应以创新作为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并且特别强调制度的供给,应该将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纳入紧密相联于制度供给问题的分析体系,对经济问题进行系统化的分析(贾康、苏京春,2014)^[2]。而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更多依靠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在经济增长动力进入转换期,发展模式迈入新常态,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已成为当下紧迫的任务。吴镇宇和张文魁(2015)认为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有三种效应。生产效应,民营企业具有更高的经营效率和创新精神,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经济增长潜力;投资效应,民营企业对市场具有更强的敏感性,可以更快,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机会,资金使用效率较高;价格传导效应,在市场竞争激烈的地方,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消化企业上升成本,具有更强的平抑物价上涨的能力^[3]。

民营经济的生产效率以及其与区域之间的发展关系一直是学者关注的焦点。王争(2008)等利用普查数据系统研究私营企业的生产率,结果发现行业之间近90%的生产率差异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地区之间生产率差异主要来源于劳动力人均资本^[4]。才国伟(2012)等从行政效率视角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晌,使用中国城市数据和二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方法,研究得出地方政府的外资竞争,能够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5]。陈广胜(2007)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为例,分别从制度、管理、组织、文化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民营经济发展的模式^[6]。田泽永(2008)等使用面板数据验证民营经济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东部地区长期内民营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短期则互为因果;中部地区在长期和短期均互为因果;西部地区仅在长期存在互为因果关系^[7]。胡大立(2006)通过实证得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民营经济发展差距呈正相关性,并得出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的本质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差距^[8]。

学者们普遍认为“供给侧改革”是中国未来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转型的主要手段。供给理论可以追溯到“萨伊定理”,Say(2001)认为萨伊定理受古典自由主义的影响,并启发了经济学研究中“生产和消费、供给和需求”相互影响决定市场容量的思考^[9]。贾康(2014)等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出发,阐述了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和外延,给出了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实施路线^[2]。刘伟(2014)等建议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

需求管理为辅的“微刺激”政策,既能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又尽可能促进结构调整^[10]。邓磊(2015)等认为供给侧改革需要通过双侧调控体系推动经济发展,借助创新、制度和结构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引擎^[11]。胡鞍钢(2016)等提出经济新常态的典型特征就是结构性产能过剩为特征的“供给失灵”,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居民有效需求受供给侧制约不能满足,国内消费和生产之间脱节严重,都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实现长期的结构性调整^[12]。

综上所述,学者们分别从生产效率、制度与管理等视角研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问题,但对民营经济生长的驱动力以及空间分布特征仍鲜有研究。本文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特色:(1)从供给侧要素配置视角,即资本、劳动与技术,研究了三大要素对民营经济的驱动效应;(2)在空间分布和区域范围上,论证了三大要素与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心,以及七大经济区民营经济各自发展的驱动特征。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三部分,从时间维度对民营经济生长驱动要素分解,以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LMDI)分析不同要素对民营经济生长驱动强度的强弱。在空间维度上,基于重力模型计算民营经济生长总量和资本、劳动、技术在全国范围内的空间分布特征。第四部分,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程度和要素禀赋富集度,研究各个区域三种要素驱动对民营经济生长的强弱;第五部分,在前文的研究基础上,总结分析民营经济生长驱动要素的特征,比较区域间民营经济发展趋势,进而得出政策建议。

三、时间和空间维度下民营经济要素驱动轨迹

(一) 数据和指标

民营经济历来没有标准的定义,中华工商业联合会提出广义和狭义民营经济的概念。中国所有制企业主要分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港澳台投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其中广义民营经济是指除了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以外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统称,而狭义的民营经济则进一步除去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使用广义的民营经济定义,以下指标的数据处理均按照总量减去国有及国有控股的方法。

冯兴元和何广文(2013)根据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政府对民营经济采取的不同政策,将民营经济发展史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本文在其基础上按照民营经济生长模式将其综合为四个阶段^[13]:(1)1949—1978年,民营经济处于接受改造阶段;(2)1978—1992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促进了个体经济的恢复,民营经济处于复苏并且逐步发展阶段;(3)1992—2012年,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视察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些,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以此为标志,民营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程度更深,政府出台了各种鼓励和引导的政策,如非公经济36条和非公经济新36条等,民营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4)2012—至今,201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速首次破八,经济进入新常态,民营经济进入稳定发展阶段。从以上划分阶段可以看出,1992年是民营经济真正进入加速发展期,因此,本文以1992年为分界点,研究资本、劳动力、技术三种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强度。使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LMDI)研究各要素对民营经济的驱动强度,该方法最主要的特点是对所有因素进行分解,并且无残差,具有残差为零、聚合一致等优势。根据LMDI分解法,对民营经济生长的三大驱动要素进行分解,表达式如下:

$$\begin{aligned}\Delta V &= V^T - V^{T-1} = \Delta V_L + \Delta V_K + \Delta V_E \\ \Delta V_K &= G(V^T, V^{T-1}) \cdot \ln(\Delta V_K^T / \Delta V_K^{T-1}) \\ \Delta V_L &= G(V^T, V^{T-1}) \cdot \ln(\Delta V_L^T / \Delta V_L^{T-1}) \\ \Delta V_E &= G(V^T, V^{T-1}) \cdot \ln(\Delta V_E^T / \Delta V_E^{T-1}) \\ G(V^T, V^{T-1}) &= (V^T - V^{T-1}) / (\ln V^T - \ln V^{T-1})\end{aligned}$$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就是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最优配置,在具体经济增长核算中,要素投入一般包括资本,劳动力和技术。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各阶段三种要素的投入组合结构会有所不同,对经济增

长的驱动强度也会相应改变。使用 LMDI 分解法对1992–2013年中国民营经济增长的资本、劳动力与技术要素进行分解。其中 V 代表工业企业总产值,其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K 代表资本,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作为代替。 L 代表劳动力,数据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登记类型的年末城镇就业人员。 E 代表科研经费支出,由于部分省份统计缺失,以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作为补充,西藏缺失严重,去除该省份。1998年之前,国有企业的科研经费支出数据缺失,因此,各省份的 R&D 数据范围是1998–2013年,分解结果见表1。

表1 1992–2014年中国民营经济增长驱动要素 LMDI 分解结果

时间(年)	劳动驱动强度	技术驱动强度	资本驱动强度	时间(年)	劳动驱动强度	技术驱动强度	资本驱动强度
1992	0.0033	0.0271	0.0688	2004	0.1414	0.8227	0.7957
1993	0.0025	0.0105	0.2364	2005	0.2011	1.0631	0.9959
1994	0.0179	0.0372	0.2366	2006	0.2498	1.5292	1.3631
1995	0.0007	0.0123	0.1796	2007	0.3148	1.8571	1.6636
1996	0.0141	0.074	0.1468	2008	0.2945	1.8312	1.8906
1997	0.0664	0.0504	0.0815	2009	0.3608	1.6842	2.0671
1998	0.2244	0.0632	0.0902	2010	1.4075	2.4228	2.4534
1999	0.0607	0.0709	0.0574	2011	0.4474	2.8478	1.9965
2000	0.0598	0.1467	0.1738	2012	0.4953	2.4333	2.7355
2001	0.2689	0.159	0.2243	2013	0.8051	1.9745	2.9338
2002	0.1189	0.1857	0.3487	2014	0.5438	1.473	2.6316
2003	0.1258	0.3118	0.6383				

(二) 时间维度下民营经济增长要素的动态分解

图1的要素分解结果表现出四个特征:(1)以2002年为分界点,2002年之前,资本、劳动与技术的驱动强度差别并不明显,2002年之后,资本和技术的驱动强度远高于劳动驱动强度。(2)2002年之后,资本和技术驱动强度增长速度明显高于2002年之前,劳动驱动强度也有所上升,但提高并不明显。(3)资本和技术驱动强度表现出螺旋式上升的特征。(4)2012年之后,资本、技术和劳动的驱动强度表现整体下降趋势。下面本文将从资源配置角度,并结合民营经济发展阶段特征逐一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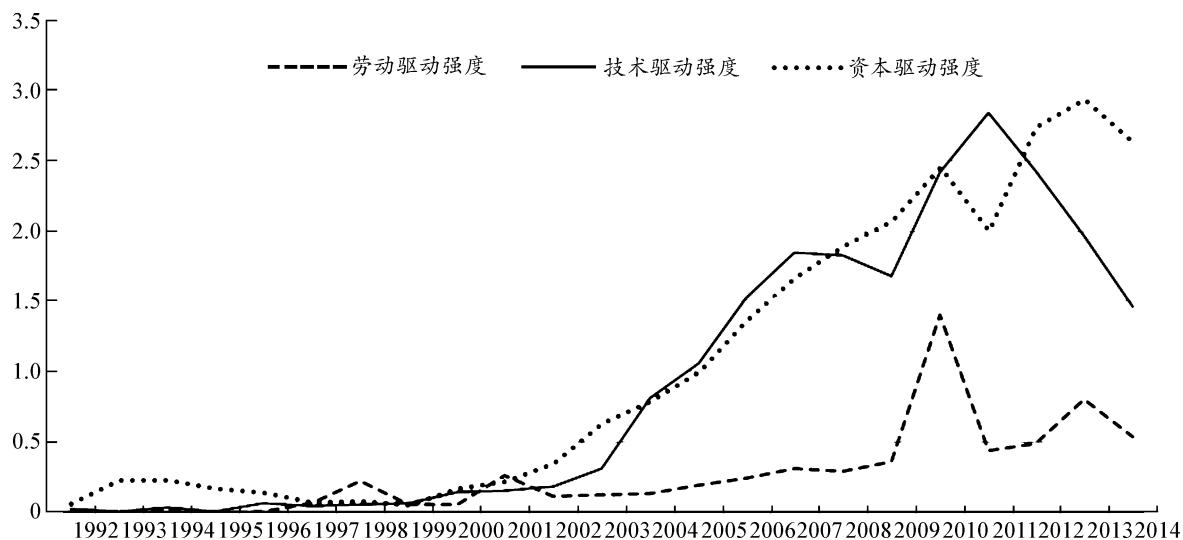


图1 民营经济增长驱动要素 LMDI 分解结果

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标志着民营经济进入黄金发展期,国家明确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对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而言,资本的相对稀缺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更大。同时,政府对民营经济的认可,解除了民营经济在发展中的疑虑,因此,在1992年到2001年之间的大部分时期,资本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驱动强度最大,民营经济兴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资本的扩张。

资本和技术都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资源,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下大力发展重工业,国有金融资本投入模式和资本驱动型一致,但是在市场化和产权改革后,以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资本没有发挥出最佳的资本配置效率,也没有有效地促进民营经济的增长。计划经济脱离了资源稀缺性,资源配置也无法达到最佳效率。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外开放程度加深,资本和技术的稀缺性相比之前都有了一定的缓解。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有多种所有制企业共存,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联营企业等。与其他经济体相比,民营企业具有生产效率高、经营方式灵活、市场反应能力灵敏、产权结构清晰、激励机制较强等优点,对民营企业而言,主导其生存逻辑的就是市场逻辑,只有提高自己本身生产效率,才能获得市场份额,而国有企业由于是地方或中央政府控制,具有多重代理、监管不严等问题。张杰(2011)等认为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敏感性,以及更高效的微观经济效率,在管理和组织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并且能够将这些优势最大化利用转化为产出,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实施自己的战略^[14]。

2002年之后,劳动驱动强度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征,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8年,劳动力处于供大于求阶段。劳动驱动强度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贡献有限,主要原因在于从2000年开始,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郑鑫(2014)测算得出,人口城镇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0.84个百分点^[15]。由于过剩劳动力人口素质并不高,因此,所从事的行业多为民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一般性行业,以加工制造业、建筑业、运输业、餐饮业和社会服务业为主,这些行业大多以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为主,其行业进入难度也相对较小。同时由于这一时期,每年毕业和历年未就业的大学生总数就超过700万,据测算全国每年仅能提供700万个就业岗位,因此,劳动力驱动对经济增长作用较小,呈现出低效率趋势。劳动力要素价格相对更加低廉,使得资本和技术对民营经济的驱动强度比劳动力的驱动强度更大。第二阶段,2009—2013年,“用工荒”阶段。经过接近十年的发展,中国产业结构重心开始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而产业升级与劳动力技能结构之间存在偏差,在劳动力质量上,人口素质较低,技能水平不高与产业升级之间的矛盾,间接导致了“民工荒”现象的发生。而另外一方面,劳动力数量上总体过剩,再加上人力资本不足直接导致劳动驱动对民营经济增长匮乏,但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也倒逼了劳动技能的提高。对技能培训的重视使得各地加强了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因此,在2009年之后劳动驱动强度有所上升,但提升人力资本,提高劳动技能在短时期内难以实现,因此,劳动力生产效率和产业升级所需技能之间的矛盾,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抑制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有学者提出人口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动力,但是,这种动力相对而言较低,长期以来中国表现的是土地城镇化,人口聚集作用对经济增长作用相对有限。高校教育改革的缓慢,毕业大学生的技能仍与社会脱钩,并未迎合市场需求,使得产业升级所需的高技能劳动力与大学教育培养的学生技能之间的偏差也是劳动驱动强度提升缓慢的原因之一。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为促进经济平稳增长,提出了4万亿元的刺激增长计划,4万亿的强刺激是2010年出现突变点的原因之一。

从图1可以看出,资本驱动和技术驱动呈现螺旋式上升的特征。企业资源整合能力的强弱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方面,企业扩张是现有资源作用的结果,而驱动企业发展的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民营企业在各地蓬勃发展,在企业建立之初,扩建厂房、购买设备都需要各种资本,因此,2001年开始,资本驱动强度大于技术驱动强度。而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会面临一个转折点。后进入市场的企业会模仿和跟随先进入的企业,此阶段,市场竞争激烈,利润降低。这个阶段扩大资本已经不能提高企业利润,为了扩大市场份额,部分企业在产品研发和创新上取得成果,进而扩大市场份额,因此,从2004年开始,这一阶段民营经济表现为技术驱动力大于资本驱动力。由于产品的差异化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反映在企业的扩张行为中,就是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具体表现为扩建厂房,增加生产容量,因此,从2008年开始,资本驱动力又大于技术驱动力。后期企业模仿先期企业产品后,产品差异化

缩小,新一轮的技术创新驱动再次开始。因此,整体上资本和技术表现为螺旋式上升的特征(表2)。

表2 资本与技术驱动强度分阶段特征

时间	2001—2003年	2004—2007年	2008—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2013年
要素作用强度	资本 > 技术	技术 > 资本	资本 > 技术	资本 = 技术	技术 > 资本	资本 > 技术

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但大部分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仍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属于资源要素的竞争类型。低端锁定的发展势能和路径依赖惯性过大,且同质化严重,再加上大部分企业家功利主义盛行,对技术创新、企业转型升级以及长远战略规划普遍缺乏,国内发展阶段变化以及节能减排硬性约束的强化,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用工难、融资难、原材料成本和人力资本成本快速上升等问题。拼价格、拼资源、拼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持续,再加上世界经济恢复放缓,靠出口换增长的方式也不会重来,因此,2012年,民营经济整体驱动力表现为下行趋势。

在投资拉动型经济中,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把资源从一个部门配置到另一个部门,可以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带来一定时间的经济增长,但是对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因为依靠资源重新配置带来的增长,只可能是之前众多受到抑制的因素被释放出来的初期产生的高速增长。随着更多的资源得到重新配置,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收益就会迅速降低,进入2012年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正是资源配置一定阶段后,增速下滑的例证。一旦中国完成了初期阶段的追赶型经济,就必须要转变成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但这个转变过程不是一下就完成的,而是一个相对平滑的过渡过程,在转变的过程中,原来旧的政策、制度将会对创新性可持续经济增长形成约束,而创新的源泉需要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的结合,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发挥以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制度,这样才能形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 空间维度下民营经济增长要素的动态分解

民营经济在中国各地区发展差异较大,经济地理学上表现为其分布重心向高值区域转移。随着“一带一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实施以来,国家更加注重向中西部地区投入资源,制定优惠政策。所以区域内要素的重心位置更能反映出该要素的空间分布特征。在经济地理学的空间视角下,民营经济的驱动要素如何影响其发展重心的变化,其要素变化重心与民营经济发展重心是否一致,对比民营经济及其驱动要素重心的时空变化规律,能有效地反映民营经济及其驱动要素的地域空间分布的演化规律。重力模型是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出来的数理模型,其模型如下:

$$X^{(k+1)} = \frac{\sum_{i=1}^n \frac{m_i \times x_i}{\sqrt{(x_i - x^k)^2 + (y_i - y^k)^2}}}{\sum_{i=1}^n \frac{m_i}{\sqrt{(x_i - x^k)^2 + (y_i - y^k)^2}}} \quad (1)$$

$$Y^{(k+1)} = \frac{\sum_{i=1}^n \frac{m_i \times y_i}{\sqrt{(x_i - x^k)^2 + (y_i - y^k)^2}}}{\sum_{i=1}^n \frac{m_i}{\sqrt{(x_i - x^k)^2 + (y_i - y^k)^2}}} \quad (2)$$

令 $R'_i = \sqrt{(x_i - x^k)^2 + (y_i - y^k)^2}$, 则模型(1) 和模型(2) 转换为:

$$X^{(k+1)} = \frac{\sum_{i=1}^n \frac{m_i \times x_i}{R'_i}}{\sum_{i=1}^n \frac{m_i}{R'_i}} \quad (3)$$

$$Y^{(k+1)} = \frac{\sum_{i=1}^n \frac{m_i \times y_i}{R'_i}}{\sum_{i=1}^n \frac{m_i}{R'_i}} \quad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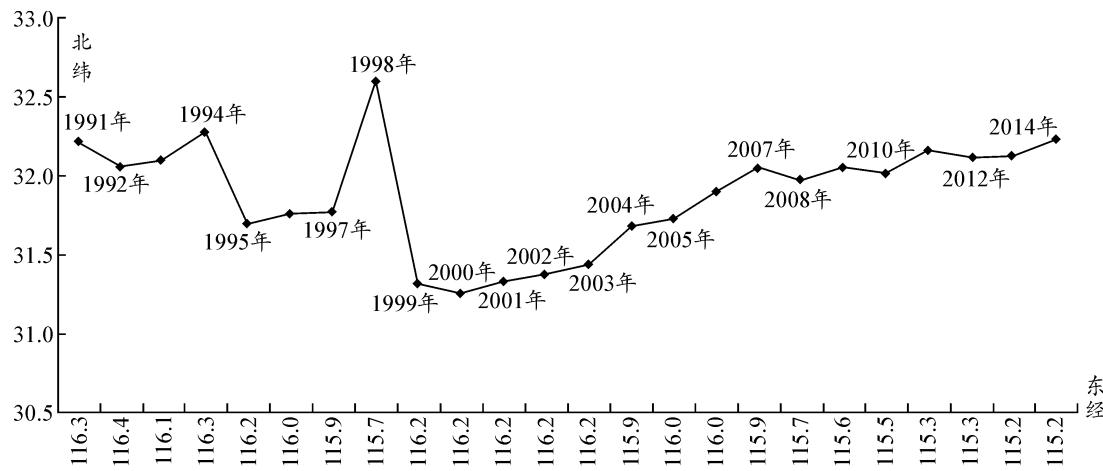
各省份中心城市 $P(x_i, y_i)$ 到重心 $Q(\bar{x}, \bar{y})$ 的距离为 R_i , 根据欧拉定理, 可得:

$$R_i = \sqrt{(x - x_i)^2 + (y - y_i)^2} \quad (0 \leq R_i \leq \infty) \quad (5)$$

当 $R_i \Rightarrow 0$ 时, 第 i 个地区重心距离越短, 当 $R_i = 0$ 时, 该地区即重心所在地。经过迭代后, 重心坐标表示为:

$$\bar{x} = \frac{\sum m_i x_i}{\sum m_i} \quad \bar{y} = \frac{\sum m_i y_i}{\sum m_i} \quad (6)$$

$X^{(k+1)}$ 和 X^k 分别代表第 $k+1$ 和第 K 年的重心地理横坐标, $Y^{(k+1)}$ 和 Y^k 分别代表第 $k+1$ 年和第 k 年的重心地理纵坐标。 m_i 分别代表民营企业总产值及其各驱动要素值, x_i 和 y_i 分别代表全国各省份省会城市的横纵坐标, \bar{x} 和 \bar{y} 分别代表迭代后的地理横纵坐标。通过计算得出民营经济发展及其要素重心轨迹结果如下:



民营经济发展重心整体上向东南方向转移。从图2可以看出除1998年偏向中部地区外, 其他时间段均偏向东南方向。虽然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得到了公认, 但是由于各个地方的资源禀赋、制度政策的不同, 使得市场化进程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樊纲等, 2011)^[16]。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需加强, 而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能够形成保证大多数产品能够按照市场供需来决定价格的市场机制(张杰等, 2011)^[17]。民营经济具有经营灵活、与市场经济接轨程度高的特点, 因此, 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方, 民营经济发展越好。田国强和崔伟(2005)^[13]认为民营经济可以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风向标。而中西部地区的市场化仍然较为落后, 尤其在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中, 地方政府出于保护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 会管制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市场, 干预要素市场的资源配置, 使得要素市场存在流动障碍, 而价格刚性和价格差别化, 均会导致要素市场的扭曲(Chen et al., 2012)^[18]。因此, 民营经济发展重心偏向东南方向。

资本具有逐利性特征, 当资本能够自由流动时, 资本会从投资回报率低的区域流向投资回报率高的区域。从图3可以看出, 在1991至2001年之间, 资本流动偏向东南方向,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投资渠道和机会越多, 当地民间资本就越活跃, 资本流动反映了东南地区的民营资本相对活跃。相比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的银行与民营企业的合作博弈中, 处于优势地位, 尤其在经济环境下行、资金紧缺时, 银行基于信贷资金的安全性, 首先会隐形限制民营企业的贷款资金, 总体而言, 民营企业处于弱势地位。2001年, 中央政府关注到省级资本不均衡的局面, 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 提出西部大开发国策, 以政策性基础设施建设为代表的国家资本开始向中西部转移。市场经济条件下, 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 也符合边际生产递减规律。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其天然地理优势, 在初始时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 在积累一定程度后, 边际生产率递减的劣势开始显现, 出于逐利性的特点, 资本开始向中西部转移。陈东和樊杰(2011)通过测算银行间信贷资

本流动方向,发现2007年后银行信贷资本并未从发展条件较差的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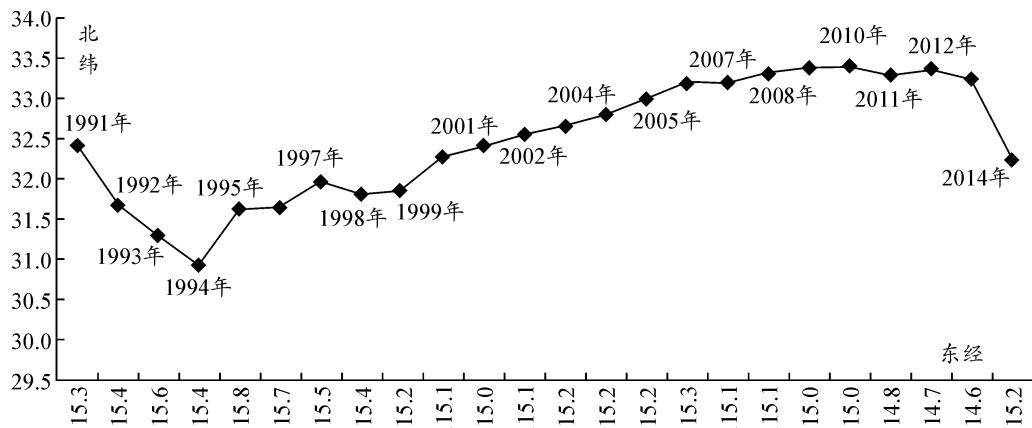


图3 民营经济资本重心空间动态转移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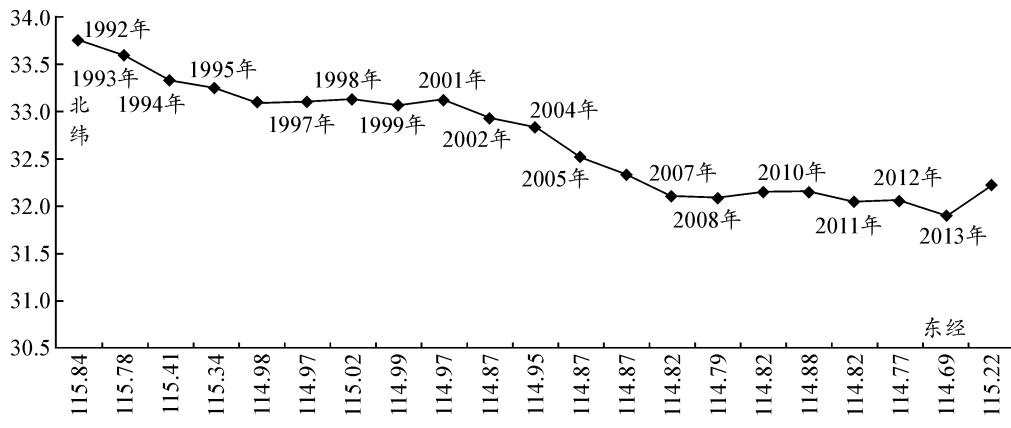


图4 民营经济劳动力重心动态转移轨迹

从图4可以看出劳动力重心向东部地区转移,劳动力的区域转移和产业转移的一致性是人口转移的重要特征。其中人口流动从事的主要产业以民营经济占比较重的制造业为主,比重高达60.3%,其次是建筑业,批发零售,服务业等。流入东部地区的大量劳动力,促进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人口向东部地区大量流动虽然是市场主导,经济结构转换的必然结果,但是更重要的是当地民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制。

梁泳梅(2011)等认为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素质要远高于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但是利用效率却要低于该地区^[20]。主要原因在于该地区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素质并未匹配。因此,从2000年开始,大部分高素质劳动力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形成大学生的“孔雀东南飞”和“民工潮”的现象,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现象也在逐年扩大。而在近年,中西部地区产业发展转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同时,加上“人口红利”即将终结,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经济劳动力成本上升,农民工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等因素,2009年开始,劳动力开始流向中部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出现“用工荒”现象。劳动力成本上升其实也是居民生活水平的上升,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是有利的一面。但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也导致原有技术条件下企业成本的上升,这是不利的一面。人口红利的消失主要原因在于计划生育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减少,近年来,劳动力需求人口不断下降,中国统计局公布,2012年工作年龄人口减少345万人。

也有学者研究了劳动力和资本在民营经济中的地位,姚先国(2005)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劳动力供给总体上超过总需求,因此在与资本的结合中处于弱势地位,尤其是文化、技术素质较低的部分劳动者^[21]。正是由于劳动力缺乏与资本抗衡的力量,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处于失衡的状态。民营企

业的劳资关系,是一种相对的弱资本与绝对的弱劳动。因此,劳动驱动强度要远小于资本驱动强度,而增强人力资本素质,提高劳动供给质量,是吸引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样也是目前供给侧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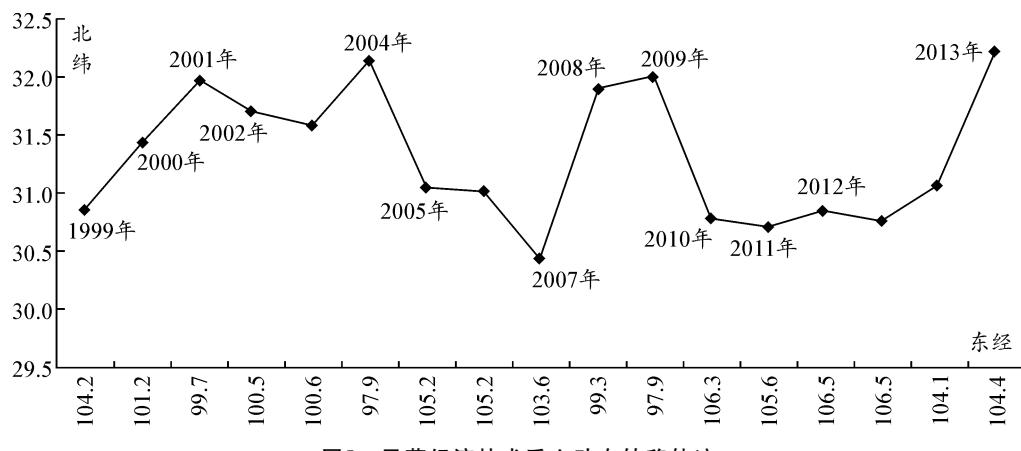


图5 民营经济技术重心动态转移轨迹

技术进步可以提高企业生产率,源源不断的推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来源有自主研发和技术引进。对外开放的直接效应就是技术进步获得较大发展,尤其是在市场化和制度化改革的前提下,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增大。雷小清(2015)认为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要高于国有企业,市场化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有较大影响^[22]。杨洋(2015)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研发补贴效果分析发现,在市场化程度较低,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下,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23]。由于中国市场机制仍不完善,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都在不停的演变,虽然相比2000年之前,市场机制已经相对完善,但整体上仍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民营经济技术投资有较大波动性(图5)。1999–2009年,金融危机以前,民营经济技术的研发投资重心偏向东南方,2009年开始,重心偏向西南方向。加入WTO后,由于外资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因此,东南地区生产要素率相对较高,对技术和研发投入较大。而东北、西北地区由于其先天的资源禀赋,形成路径依赖,对技术和研发投入比东南沿海地区要小。大多数经济学家均肯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量在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在资本和劳动力受到约束的条件下,民营企业应该通过创新来提高自身生产效率。

四、民营经济分区域要素驱动特征

在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规划的基础上,本文将中国各省市地区划分为7大经济区。具体划分内容见表3。

按照表3的划分结果,使用LMDI方法对各区域民营经济增长要素进行分解,各经济区分解结果见图6(长江三角洲)、图7(环渤海经济区)、图8(西南经济区)、图9(东南沿海地区)、图10(中部经济区)、图11(丝绸之路经济带)、图12(东北经济区)。

表3 全国经济区的划分

经济区划分	包含省市
长江三角洲	浙江、江苏、上海
东南沿海地区	福建、广东、海南
环渤海经济区	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内蒙
东北经济区	吉林、辽宁、黑龙江
中部经济区	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
西南经济区	云南、西藏
丝绸之路经济带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重庆、四川、云南、广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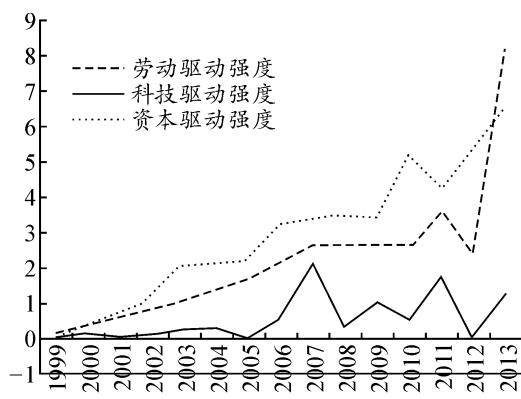


图6 长江三角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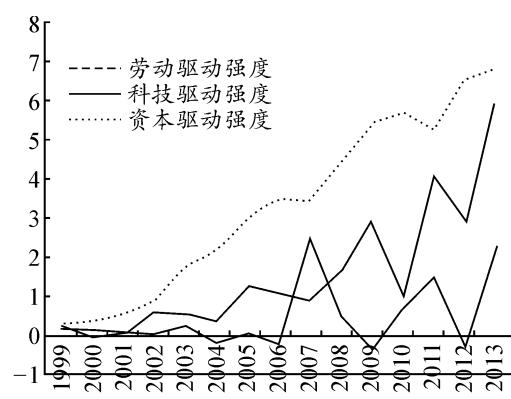


图7 环渤海经济区

如图6所示,自从1999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资本驱动强度最大,呈稳定上升趋势;其次是劳动驱动强度,唯一例外是在2013年,劳动驱动强度超过资本驱动强度;科技驱动强度最小,并且波动性最大。环渤海经济区(图7)与长江三角洲类似,区别在于波动性更大,并且技术驱动在2004年、2006年、2009年与2012年出现负值。环渤海经济区由于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受惠于国家倾斜性政策,因此,相比其他经济区,其资本驱动强度比科技驱动强度和劳动驱动强度要更大些。2004年以前,西南经济区(图8)民营经济三种要素驱动强度差别并不明显,2005年之后,资本驱动强度成为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科技驱动强度多数年份为负。东南沿海地区(图9)在2005年以前,劳动驱动强度最大,在2005年之后,资本成为其主要推动力量,并且从图9可以看出,三种驱动强度之间的差别并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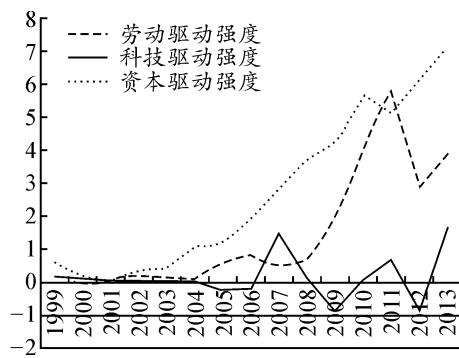


图8 西南经济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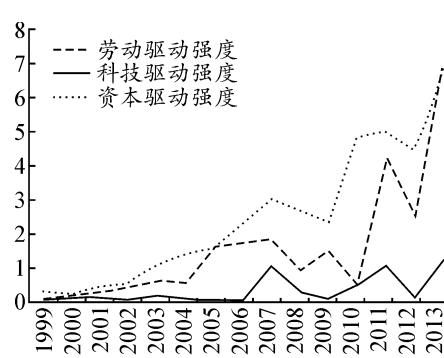


图9 东南沿海地区

整体来看,东南沿海和长三角地区的市场经济体系相比其他地区要完善,因此民营经济的资本回报率要高于其他地区。胡凯(2012)等估计出中国资本使用效率,得出长三角和东南沿海是资本流入地区,而西部地区是资本净流出地区,并且长三角地区民营经济增长的实质仍然是资本驱动型,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24]。东南沿海地区市场经济较发达,民营经济吸收了大量港台资金,形成早期积累,在初始发展阶段,一个地区的资本增长率越高,则该区域的经济增长率也越高。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形成了投资-创新-增长的良性循环,继而带动了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增长率越高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向该地区,形成区域经济循环累积的优势。长三角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能够充分利用其区位优势,持续吸收外来资金与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等先进生产要素,同时与内地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结合,据测算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吸收的人口占据了整个东部跨地区人口流动的78.1%,最终形成了该地区民营经济质的飞跃和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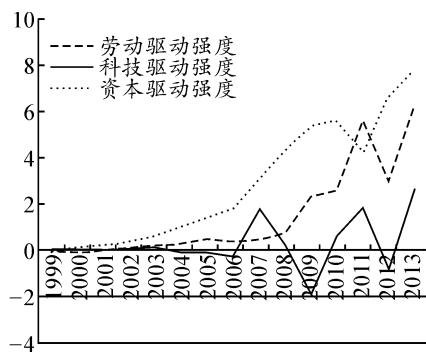


图10 中部经济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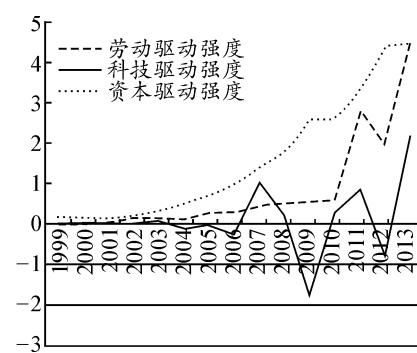


图11 丝绸之路经济带

中部经济区(图10)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图11)民营经济要素驱动强度相似,两大经济区仍是以资本驱动强度为主,其次是劳动驱动强度。2004年之前,三大驱动强度差别不大,2007年,科技驱动强度超过劳动驱动强度,2009年科技驱动强度为负,分别达到-1.91和-1.75,严重阻碍了民营经济发展。区域发展有两种资源配置模式,分别是“民本模式”和“官本模式”,而中部地区特点是投资依赖政府,民营经济没有被充分激发。市场的资源配置效应没有得到有效利用。因此,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中部崛起”战略后,资本首先成为第一驱动强度。丝绸之路经济带民营企业目前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民族传统和特色产品上,而技术优势尚未发挥出来,民营企业应该积累国际文化知识,提高核心技术研发力。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民营企业应积极发挥自身灵活、高效的优势,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在国内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可以减少国内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同时可以开拓国际市场,学习海外经验,利用当地高科技人才,获取先进的技术。

东北经济区(图12)民营经济发展的资本驱动强度和劳动驱动强度差别并不明显,技术驱动强度波动强烈,表现出科技支出的不稳定性。梁启东和王慧娟(2013)认为东北长期以来表现出政府与国企强势,市场弱势,民营经济过少的特点^[25]。东北经济区最大的特点就是国有企业比重较高,且以重化工业为主。由于重化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因此,资本驱动强度是首要的,但该地区资本驱动强度相比其他经济区仍然较低。主要原因虽然东北地区劳动力价格和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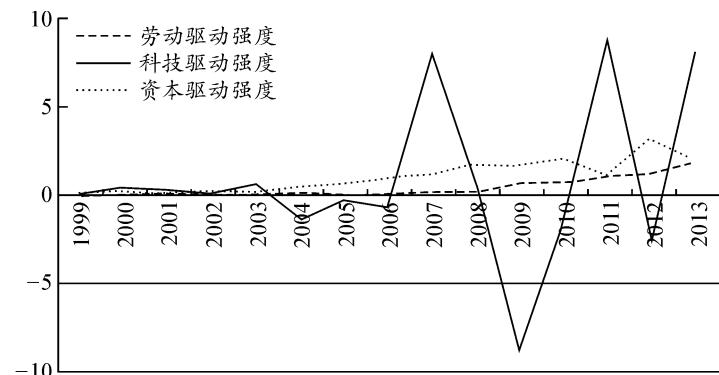


图12 东北经济区

价格均比较低廉,并且国家也对东北地区实施优惠政策,而实际上中东部地区资本流入并没有带动东北的经济发展,甚至资本仍会从东北地区迁回流出。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东北经济区已经习惯了由政府规划资源分配以及产品生产,缺乏改革的市场经济意识,再加上吸引外资体制不健全,融资能力较弱,投资软环境发展落后等原因,致使资金短缺成为该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因此,东北经济区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特点,一方面该地区以资本密集型重工业为主导产业,对资本需求较大,但同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投资软环境较差,使得无论外资或内商均不敢来投资,又表现出资本的稀缺性。东北经济区人力资本流失严重是劳动驱动强度不高的原因之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吉林省人力资本流入比例仅占流出的57%,而黑龙江的比例仅有1/3。虽然近十年来,东北三省的科技投入不断增加,但整体上偏低。以高新技术产业R&D经费投入为例,2012年,东北三省经费总投入为80.49亿元,广东省为6048.37亿元,是东北三省的75倍。

各区域 LMDI 检验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对民营经济增长驱动力普遍较大,并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这说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增长主要还是得益于物质资本投资,也符合中国经济增长实践。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中国民营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没有较大的变化,即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经济增长呈现出资本驱动型的增长类型。长期以来中国民营经济增长驱动依赖投资,投资又依赖于储蓄,储蓄成了民营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就劳动生产率而言,提高劳动力生产率的主要途径就是劳动力的跨部门和跨区域流动,即让劳动力从低生产率向高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域流动。劳动驱动强度虽然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但是各个区域仍有差别。近年来,中国主要制造业基地如长三角和珠三角,开始出现的“民工返迁流”和“民工荒”现象,正是中国跨区域劳动力流动开始出现缓慢流动的倾向,区域间工资差异缩小是流动缓慢的主要原因。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需要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而创新需要一个公平竞争、市场经济、自由开放的外在环境,这样才能使不同背景和社会的人都为了创新而竞争,新的创新企业不受到老的企业约束,新企业打破垄断,新技术代替旧技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新供给学派观点为基础,从供给侧要素配置视角,分别通过 LMDI 模型和重力模型计算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三大要素对民营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主要结论如下:(1)从时间维度来看,1992—2014年,资本驱动强度和技术驱动强度要高于劳动驱动强度,在2002年之后,资本和技术驱动强度增长速度远高于之前,说明中国民营经济增长是资本和技术双驱动类型;劳动驱动强度在2009年之后有较大提高,说明虽然中国整体人力资本素质不高,但是民营经济增长类型已经开始向高素质人力资本驱动类型转换,“民工荒”与“就业难”的双重矛盾也可以说明这一点;资本和技术对民营经济的驱动强度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特征,民营企业大多从事一般性竞争性行业,这一现象背后反映了民营企业发展建立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2)在空间视角下,民营企业发展重心偏向东南方,民营经济对市场化的敏感度要更高,说明中西部地区市场化机制仍需加强。民营经济的资本与劳动力都开始向中部转移,而技术重心向西南方向转移,说明中部地区对民营企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强。(3)区域经济发展中,虽然东南沿海地区和长江三角洲的市场经济体系要比其他地区更加完善,但增长实质仍然是以资本驱动型为主,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贡献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东北经济区由于受历史遗留发展、政策体制不健全、人才流失严重以及科技投入严重不足等原因使得资本和劳动驱动强度增长均不明显,且科技驱动强度波动较大。鉴于此,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虽然中国民营企业的的发展以资本驱动型为主,但在投资拉动型经济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限的,在中国经济度过追赶型增长阶段后,必须转变成创新驱动的增长方式。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民营经济应该由资本和技术双驱动类型转变为以技术驱动型为主,这样才能实现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的产业升级。政府须维持更加开放、公平竞争的外在环境,支持民营企业的“创造性破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劳动驱动强度在近几年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人才缺失始终制约着民营企业的的发展,尤其是各种专业人才的匮乏。随着民营企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和行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更加强烈,需要企业优化内部人力资源结构,加强技能培训和定向培训,充分发挥出劳动力素质的潜能。中国整体上面临着人口素质不高,技能水平偏低的现实,制约了民营企业转向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升级,政府在实行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的模式中,应以高精尖的人才培养为目标,定向培养产业升级中所需劳动力。

第三,民营经济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区域间民营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东南沿海地区及珠江三角洲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民营经济发展相对较为活跃,中西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提高其市场化程度,基于市场主导型的理念,制定各种政策,吸引东南地区民营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发展。东北经济区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区域,国有企业过大限制了民营企业发展空间,因此,需要积极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优化该地区经济结构,取消针对民营企业的进入壁垒,放宽市场准

入制度,以激活当地民营经济活力。

第四,在以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转变过程中,对制度变革的要求会增大。追赶型经济依靠的是技术转移,现有增长方式的潜力即将枯竭,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实现持续性的增长,民营企业需要从利用技术转向生产技术,虽然中国专利申请量连续四年排名第一,但创新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仍然较低,因此,需要政府完善法律环境,减少对民营企业的干预,提高产权保护水平,才能刺激民营企业不断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从而使民营经济升级为以技术密集型为主的增长方式。

参考文献:

- [1]厉以宁.认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J].中国物流与采购,2010(4):42-43.
- [2]贾康,苏京春.探析“供给侧”经济学派所经历的两轮“否定之否定”——对“供给侧”学派的评价、学理启示及立足于中国的研讨展望[J].财政研究,2014(8):2-16.
- [3]吴振宇,张文魁.国有经济比重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2000-2012年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5(2):12-16.
- [4]王争,孙柳媚,史晋川.外资溢出对中国私营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来自普查数据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08(1):129-158.
- [5]才国伟,钱金保,鲁晓东.外资竞争,行政效率与民营经济发展[J].世界经济,2012(7):123-141.
- [6]陈广胜.关于创新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7(3):58-63.
- [7]田泽永,江可申,谢忠秋.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较研究——基于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分析[J].预测,2008,27(1):29-33.
- [8]胡大立.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民营经济发展差距的相关性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6(2):17-25.
- [9]SAY J B. A Treatise on Political Economy: Or the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Wealth[M]. Canada: Batoche Books, Grigg & Elliot,2001:90-101.
- [10]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2014(4):5-13.
- [11]邓磊,杜爽.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动力与新挑战[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1):10-15.
- [12]胡鞍钢,周绍杰,任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适应和引领中国经济新常态[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18-25.
- [13]冯兴元,何广文.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环境报告:2012[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10-15.
- [14]张杰,周晓艳,李勇.要素市场扭曲抑制了中国企业R&D? [J].经济研究,2011(8):78-91.
- [15]郑鑫.城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其实现途径[J].中国农村经济,2014(6):4-15.
- [16]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经济研究,2011(9):4-16.
- [17]田国强,崔伟.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前景[J].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4(1):39-43.
- [18]CHEN V Z, LI J, SHAPIRO D M, et al.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Innovation: An Emerging Market Perspective[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4, 31(1):1-24.
- [19]陈东,樊杰.区际资本流动与区域发展差距——对中国银行间信贷资本流动的分析[J].地理学报,2011(6):723-731.
- [20]梁泳梅,李钢,董敏杰.劳动力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区域错配[J].中国人口科学,2011(5):36-48.
- [21]姚先国.民营经济发展与劳资关系调整[J].浙江社会科学,2005(2):78-86.
- [22]雷小清.技术进步驱动生产服务业:模式,问题和对策[J].管理学刊,2015(5):46-50.
- [23]杨洋,魏江,罗来军.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J].管理世界,2015(1):75-86.
- [24]胡凯,吴清,胡毓敏.知识产权保护的技术创新效应——基于技术交易市场视角和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12,38(8):15-25.
- [25]梁启东,王慧娟.沈阳经济区人口问题与产业优化探析[J].宏观经济管理,2013(4):71-72.